

启蒙对话与个人发现^{*}

——重读鲁迅的《野草》

田中华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从启蒙话语建构和知识分子自我发现的角度探讨了新文化运动的低落如何影响了鲁迅《野草》的写作。启蒙话语的建构是以有效的对话关系为基础的,因为缺乏共同的精神自觉,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之间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启蒙话语既然难以完成建构,知识分子或退守,或复仇,或沉默,不过是发现和体认了自我深深的无力感,正是这种心理造成了《野草》黯淡、低沉的情绪基调。

关键词:知识分子;对话;启蒙话语;无力感;发现;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4)02-0034-04

鲁迅先生的《野草》,以其大胆的形式实验和深刻的内心剖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实验性作品。作家自己对这一组散文诗也颇为珍视,曾经称之为“废弃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1] (四卷p.356)}这23篇短文流露出浓重的低沉、黯淡、迷茫的调子,海外学者李欧梵也曾谈到,《野草》是由鲁迅的“黯淡的情绪和受苦的感情所组成的潜意识超现实世界的文学结晶”。^{[2] (p.101)}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黯淡的情绪和受苦的感情”是和鲁迅写作时独特的个人心境有关系的:《野草》写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之间,这一阶段是鲁迅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影响鲁迅情绪的主要因素既有新文化运动的低落也有某些私人性事件(周氏兄弟的失和以及女师大事件)。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低落是以何种方式(或机制)令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的孤独与痛苦的呢?本文尝试从启蒙话语建构及知识分子自我发现的角度重读《野草》诸篇,以找到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下对“五四运动”的某些认识。“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

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和社会公正。^{[3] (p.500)}它以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努力从思想观念层面上实现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运动”可称得上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众所周知,五四启蒙话语建构的主体是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笔者以为二者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组“对话”关系。^①此一“对话”关系的完成又需要双方以某种精神自觉(包含了对爱与恨的能动体验与领悟,对一般价值的体认与接受)为前提的“说话”欲望,如此,“对话”行为才是有效的,否则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将使“对话”成为“自言自语”。五四启蒙话语的主题词科学、民主、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每一点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的参与,可以说这种有效的“对话”关系也是五四话语建构的前提。知识分子或可看作“士”,中国传统的“士”历来宣扬“志于道”,即如宋儒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知识分子“说

^{*} 收稿日期 2003-10-15

作者简介:田中华(1981-),男,山东枣庄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① 本文中所使用的“对话”一词不同与巴赫金复调理论中“对话”一词。我使用该词的理由如下:“对话”一词强调了主客双方的相依相峙,突出了双方的情绪互动,凸显了双方的价值互证。此外,话语的英文原词“discourse”可以翻译为“说话的方式”,本身即强调了它作为交流方式和手段的意涵,如福勒所说:“它应该是主体间性的,是一种要求共同价值的交际行为”。

话'的传统心理基础。“对话”作为一种交互行为需要双方的参与,如果缺少一般民众的参与,知识分子的“说话”行为只能成为无效的单向度努力。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正是《野草》中民众以某种精神自觉为基础的“说话”行为是否存在。

《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乃是鲁迅整个心灵世界的映照^④(p.76)。这哲学的表达在诸篇中是有所侧重的:如果说《死火》、《影的告别》几篇表现了鲁迅在两种悖论性的精神处境间左右徘徊的痛苦(如“死火”的或冻灭或烧完、“影”的或为黑暗所吞灭或因光明而消失),以及对这精神困境以自我毁灭的形式所作的“绝望的反抗”(如“死火”的“那我不如烧完”、“影”的“独自远行”);那么《求乞者》、《风筝》、《这样的战士》、《复仇(一)》(二)》等篇什侧重探讨的正是“独异个人”欲与“庸众”建立有效的“对话”关系并经此完成对启蒙话语建构的努力。^①

我想以对《风筝》一篇两个层面意涵的探讨展开论述。表面上《风筝》在作者温煦的叙述语调下具有着忆旧文的形式框架:飘逸与飞翔的“风筝”这一意象,跨越了时空局限维系起北京与故乡、冬季与早春、今日与童年、我与兄弟,讲述着对一段童年往事的记忆,并足以造成读者对一篇散发出记忆芳香的抒情短章的阅读期待。但是《风筝》一文在深层上却具有某种寓言意味:旧时记忆的阴影“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今日令作者因愧疚而陷入心灵困境之中(“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我”本能地开始寻找实现自我救赎的方法(“去讨他的宽恕”)。然而当“我”真的“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后“他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什么也不记得了”,惟有一句“有过这样的事吗?”“我”与兄弟的纠葛可以看作是一场对话语权的争夺,一开始,作者似乎牢牢把握着话语的主动权,你看“我”对行动与结果间的必然性有着那么清晰与自觉的信心:

.....

我.....等他说.....

那么,我的心就一定轻松了,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

也从此宽松了吧

.....

(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作者(或许也包括读者)似乎正想当然地等待着领受宽恕呢,然而他人(我的兄弟)以“遗忘”的举动粉碎了自我(作者以及读者)所有关于悔过与宽恕、呼喊与回应、等待与实现的幻想,以拒绝参与的姿态夺回了话语主动权,并打破了“对话”有效性的实现(“全然忘却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事实是“我”欲谋求与兄弟“对话”的努力,从一开始即是单向度的,作者对过往行为的自责与其兄弟事后“惊异”的表情表明双方的精神自觉实在缺乏一致的起点。

《颓败线的颤动》以两个梦中的场景结构起了全篇;“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演绎了一段关于爱与恨的悲情故事。母亲以“为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而颤动”的肉体养育了饥饿的女儿,但隔了许多年之后,这一个已经垂老了的女人所领受的却是女儿等人的怨恨和鄙夷,冷骂和毒笑。这女人所经受的,不止是由“迟缓,然而尚且丰腴”到“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生理变化,更是付出了眷恋、爱抚、养育与祝福却收获了被决绝、被复仇、被歼除与被诅咒的心灵痛楚。母亲与女儿的“对话”,即便以肉体的残损为代价也无法有效地实现——前者所经历的复杂的情感体验从“苦痛、惊异、羞辱、欢欣”到“害怕、委屈、劳累”始终无法为后者体验与领悟,爱的付出收获的却是恨的回报也自然不难理解了。两篇《复仇》的悲剧性也在于因其中一方精神自觉的缺席而造成的“对话”的难以实现:路人们从四面奔来“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以色列人钉杀了“神之子”并玩味其间的快意。这对立的“一男一女”和“神之子”的举动,在旁观者和杀戮者“看”的行为中已演化为某种戏剧性的表演,而其中所蕴含的对道义的追求、对责任的承担皆被消解殆尽。应该说,因为深感民众在“对话”中的愚昧、落后,鲁迅在行文中对“看客”不觉醒、不觉悟的批评是显而易见的了。

爱与恨、悲悯与诅咒是“独异个人”的情感交响曲。悲悯始于爱,是因爱无法为他人领受却终于难以释怀的自伤之情,诅咒亦始于爱,是立意摆脱情感尴尬处境(欲施爱而不能)的激愤之义。

④ “庸众”与“独异个人”的概念取自鲁迅《随感录》38(卷-311页),它们更能从字面上突出二者精神姿态的区别。本文参照了李欧梵的论述,见《铁屋中的呐喊》80~100页。
万方数据

《复仇(二)》中的“神之子”、《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女人即始终陷于悲悯与诅咒相互交织的复杂的情绪体验中。有时启蒙者的精神困境不止在“爱”的尴尬而且在“恨”的无能。《这样的战士》中“战士”陷于“困兽”般的精神困境中——在“无物之阵”中,他所见的是“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举起了投枪”的行为预制了某种“对话”的可能,但与“战士”相对的另一方始终是缺席的,它何尝正面迎击过?文中三次提到了“然而,他举起了投枪”,但由于对象的缺席,“举起”的行为不过是能指的无效滑动而已。

既然有效的“对话”关系难于建立,“独异个人”只能选择或退守,或“复仇”,或沉默。然而我们以下的论述将表明,无论何种姿态都将导致他们对自身无力感的深深发现与体认。退守,如《风筝》中的“我”。作者欲与“兄弟”和解的举动,不仅没有令其摆脱心灵困境,反而使之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此文结尾处,陷入了尴尬的情感处境中的“我”终于决定从对旧事的回忆中抽身出来,“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正可看作是对自身无力感的发现。我们若对比早年同一题材的《我的兄弟》,会发现,作者在结尾处的处理已经消尽了先前的积极姿态(“然而还是请你原谅吧”),而是选择了无可奈何的退守(“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其内心的悲哀是可以想见的。

复仇,如《复仇》中的“神之子”、“一男一女”与《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鲁迅尝言,“题名‘复仇’,而所以复仇者,或如此一男一女”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①,或如“神之子”玩味着对“可怜的人们”的悲哀和对“可诅咒的人们”的欢喜。但是,这些并不能带给施暴者与旁观者以真正的精神创痛,如无聊人不过是“依然无聊”,以色列人也毫无罪恶之感——他们实在是缺乏对自身罪恶加以感知的精神自觉。至于与“庸众”相对的“独异个人”一方,或“沉浸在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或“沉醉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其所获得的难道不也仅是一种“精神的胜利”吗?“战士”在与空虚的作战中,也只能并终于“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胜者,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战士”的

形象可以看作鲁迅的自况,它一方面表现了表达了作者坚韧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揭示了作者与“虚无”作战的精神处境,其中的疲倦、无奈、厌恶等情绪体验是极为感触读者人心的。

沉默,如《颓败线的颤动》中垂老的女人。当所有的爱都已为无由的恨所遮蔽,她只能赤身露体地“站在荒野的中央”;“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的,所以无词的言语”。当“对话”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她只能选择沉默,在“失语”中表达无力的反抗。然而,即使是这“无词的言语”最后“也沉没尽绝,惟有颤动”,对自身的质疑以对语言的怀疑表现出来。

《求乞者》中,鲁迅更是尝试经由他人的眼光来实现自我发现:两个孩子先后向我求乞,都“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一个“拦着磕头,追着哀呼”,一个“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我”则一律“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当我也试图扮演“求乞者”的角色时,却发现自己也陷于了“发声”或“装哑”获得的都将是“烦腻、疑心、憎恶”的处境之中。这里求乞与布施的关系所象征的恰恰是“独异的个人”和“庸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的行动(如此篇中的“发声”或“装哑”)在后者的精神“不自觉”状态面前往往陷于尴尬的处境之中;“对话”关系的有效性始终难以建立(如此篇中“求乞者”收获的仅仅是布施者“施与”行为的缺席)。篇末,“我”选择了以“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行动连能指都失去了,所得也当然是“虚无”。我想,当鲁迅欲从“对话”的另一方(即“庸众”)的角度为“独异个人”的处境寻找开脱(即求乞者总被置于“烦腻、疑心、憎恶”之下)时,他对自身的怀疑正达到了无法自我消解的程度。

“独异个人”对自身无力感的发现是一个痛苦的、历史的过程,即如鲁迅发表于1919年五四高潮期的一组题名《自言自语》的散文中就甚少这种对自我的质疑。《古城》中“我可不知道”背后的倾向性不言而喻。《螃蟹》中可以直言“就怕你要吃掉我”。《波儿》一篇则更具寓言性质,一滴泪不能改变河的味道,一滴血不能变换海的颜色,半天不能等待蔷薇花抽芽,在认识了结果的遥遥无期后仍能说出“便是终于不出,世上也不会没有蔷薇花”

① 关于我何以会记起“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旧事《我的兄弟》中语焉不详(“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风筝》则指明是“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的影响。我想“儿童”应该是促成作者行为的关键词,考察五四时期的“儿童崇拜”心理,对儿童的态度是不是关涉到启蒙话语建构的实现呢?

的希望之辞 ,正证明了当年作者的充分自信。

总之 ,五四“呐喊”者急切地希望通过对“道”(启蒙责任)的主动承担来与一般民众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关系 ,并由此完成对启蒙话语的建构。然而 ,对《野草》的重读告诉我们 ;“对话”另一方的不在场 ,消解了他们诸多的努力 ,让他们每每发现自身巨大的无力感 ,并产生了深深的自我质疑。难怪鲁迅亦写到 ;“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 ,该二人或相爱 ,或相杀 ,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1〕}(十二卷p.415) ,这正可看作是作者的反思与自嘲之辞。对自我的怀疑必然导向向某一集体力量的靠拢 ,此后的历史不是也证明了如此吗?鲁迅从

早年的“ 培物质而张文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 ”,到晚年以为“ 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与激进的政治活动密切相联的“ 左 ”派积极靠近 ,正是从建构启蒙话语到质疑、悖失启蒙话语的必然。

鲁迅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怀抱着“ 人本主义 ”的文化理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可是 ,新文化运动低潮期到来时 ,他们难于与民众建立有效的“ 对话 ”关系 ,并以此完成对启蒙话语的建构。这些导致了他们对自我无力感的发现 ,笔者认为 ,正是对自我与启蒙话语的怀疑 ,令鲁迅陷入了《野草》时期特殊的精神困顿 ,并产生了他的特殊的生命哲学——“ 反抗绝望 ”。

参考文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 [M].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第 9 版.
[3]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M].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第 9 版.
[4]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第 3 版.

Dialogue for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rereading Lu' xun 's 《The weeds》

TIAN Zhong - hua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his text study how the fall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ffect the writing of Lu' xun 's 《The weeds》. The 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 discourses is based on valid dialogue relation ,but without the same consciousness , the intellectual can not establish valid dialogue relation with the people in general.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s , the intellectual will fell back or revenge or even save one 's breath to find and realize the deeply inability feelings of themselves , and that is the psychology which bring the gloomylowering emotion mood of 《The weeds》.

Key words :the intellectual ;dialogu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inability feelings ;finding ;